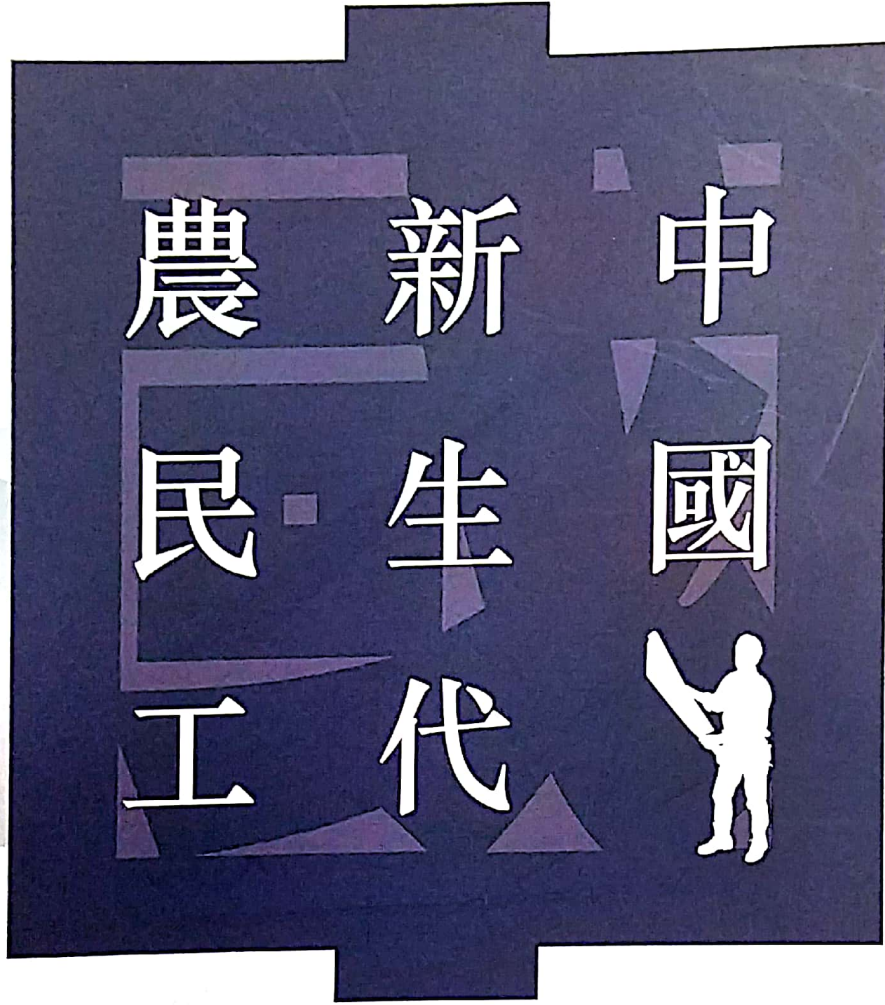


潘毅 著
牛穎 譯



MIGRANT LABOR
IN CHINA

中華書局

□ 責任編輯：黎耀強
□ 封面設計：高林
□ 排版：沈崇熙
□ 印務：劉漢舉

中國新生代農民工

□

著者

潘毅

□

譯者

牛穎

□

出版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北角英皇道 499 號北角工業大廈一樓 B
電話：(852) 21372338 傳真：(852) 27138202
電子郵件：info@chungwabook.com.hk

□

發行

香港聯合書刊物流有限公司

香港新界大埔汀麗路 36 號
中華商務印刷大廈 3 字樓
電話：(852) 21502100 傳真：(852) 24073062
電子郵件：info@suplogistics.com.hk

□

印刷

美雅印刷製本有限公司

香港觀塘榮業街 6 號海濱工業大廈 4 樓 A 室

□

版次

2018 年 3 月初版

© 2018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

規格

32 開 (210mm × 153mm)

□

ISBN：978-988-8512-07-2

本書英文版 *Migrant Labor in China: Post-Socialist Transformations*,
2016 年由 Polity Press 出版

第五章

空間政治： 宿舍勞動體制下的 生產和社會再生產

關於全球資本主義擴張，近期的大部分研究要麼關注的是一般意義上資本的作用，要麼關注的是金融化進程；在新自由主義轉向和全球經濟快速重構的大背景下，這些研究至多提供了一種對資本—國家紐帶的分析（Harvey 2007 [1982], 2010, 2014）。在對資本主義空間政治的研究中，人們往往認為，全球資本在國家的支持下獲得了特權，並最終實現了跨空間的超越。但是，另一方面，事實上是全球資本和國家共同導致了各種矛盾，反而打開了底層抵抗的空間。目前，人們對世界資本主義中的資本之謎進行了詳細的研究，但勞動的辯證法如果不是被置換的話，也只是作為一種補充性研究，尚未被深入挖掘（Lebowitz, 2003）。有一種關於當代全球資本主義重構和資本功能不斷出現危機的西方視角，受這種視角所累，我們嚴重低估了從第三世界國家自身視角出發、解讀勞動在塑造當今資本主義版圖時發揮作用的研究。

本章將以過去十年間的中國工業城鎮民族志研究為基礎，旨在將「勞動」和「階級」重新帶回全球資本主義空間政治中心。在將宿舍勞動體制概念化為一種勞動空間政治的表現形式的過程中，我們認為勞工、勞工階級及勞工同資本和國家的關係，對於全球生產空間的形成至關重要。通過實證研究我們發現，宿舍制度中包含着極為複雜的階級矛盾，這些矛盾在階級、性別和族裔等幾方面，引發了工人通過日常集體的鬥爭，去抵抗全球資本主義。本章也將重點指出，階級是可以被重新

激活的，並通過根植於底層工人的階級經歷，成為一種有用的概念，即階級在宿舍勞動體制的日常微觀政治中，呼籲農民工體驗各自有所不同的階級經歷。

2013年夏天，我們來到了位於深圳工業區工人集體宿舍的一群女工中間，她們在工廠區的小賣部一邊聊着天，一邊看着電視劇。在工廠裏小賣部是一片開放的區域，大多數來自農村未成家的工人都是在這裏度過他們非常有限的閒暇時光的。平日裏，整個工廠大門緊閉，工人們住在廠區內公司大樓南邊的五棟宿舍樓裏。宿舍裏，一些女工正抓緊時間洗澡、洗衣服，還有一些則在結束了長時間的工作後享受難得的休息時間。工人們因為在出賣勞動力的城市裏無處可去，不得不住在離公司很近的公寓裏，或者擠在公司提供的住宿裏。中國的新興工業化城鎮都擁有令人印象深刻的工人集體宿舍，一棟樓往往可以容納上千人。在寒冷多風的夜晚，宿舍走廊上晾着的衣服就像各國彩旗一樣上下翻飛。這是中國新工人階級的旗幟，標誌着資本無國界，也象徵着社會主義大地上的苦難。

中國重新定位為世界工廠，依靠宿舍勞動體制，保證了中國新工人階級在全球資本主義的核心進行重構和抗爭（Pun and Smith 2007）。沿着當今世界資本主義的軸心，我們認為不管資本、工業和個人的具體境況如何，中國作為世界工廠的最大特徵，是對宿舍勞動體制的「系統性」應用。在當代中國愈來愈複雜的階級關係中，宿舍勞動體制通過不同級別的空間化勞

動，逐漸演變為控制、壓榨勞動生產和再生產的手段。這一體制還包含了異常複雜的階級矛盾，而這些矛盾引發了工人通過日常和集體抗爭對全球資本主義進行反抗。除了生產關係領域，宿舍勞動體制產生的日常再生產政治也成了抗爭的場所。

我們需要對跨國生產過程中的結構性要素進行更為微觀、更為深入的探索，探索空間生產的重構如何影響了多種規模生產地點的勞動政治，在這裏全球經濟的宏觀場域與地方政治、勞動市場、性別關係和車間關係的微觀場域相遇。在本章中，我們將探討中國特殊的勞動體制，即宿舍勞動體制，以及在該體制下打工者發起的對抗和反抗。從階級和性別的角度來看，我們將宿舍勞動體制理解為一種特殊的用工形式，這種形式在中國新工業區廣泛使用，以促進全球生產。

什麼是宿舍勞動體制？

2005年夏天，我在東莞迪斯尼供應廠的宿舍樓三樓見到了阿梅。跟第一代女工在宿舍裏書寫家書不同，新一代女工現在用手機給親人、愛人發短信。阿梅說：「宿舍只是一個睡覺的地方，這裏是沒有生活的。但是誰介意呢？連工人自己都不介意。」這裏的宿舍只有三十平米那麼大，卻住着八位女工，每人僅擁有一張床和一個私人櫃子，八個人共用一個洗手間，也在洗手間裏洗澡。我們以為這樣的住宿條件已經非常惡劣了，

但是在第一代打工者，這麼大的宿舍裏一般住着超過二十個女工，相比之下，第二代女工的生活條件已經有了很大的進步了。不用工作時，阿梅和其他女工除了待在公司宿舍，很少有別的地方可去。阿梅覺得待在工廠宿舍是沒有自由的。對於其他人來說，跟住在宿舍相比，她們更願意在公司附近的村莊裏租房居住，一般四五個人合租一套房。就這樣，住在宿舍裏的所有工人，被資本扶持的宿舍勞動體制剝奪了正常的生活。

什麼是宿舍勞動體制？宿舍勞動體制以工廠體制下日常生產和再生產的空間重構為特徵，將工作空間和住宿空間高度壓縮在一起。公司通過在工廠附近提供住宿來安置農村的大量剩餘勞動力，在此過程中將空間、國家和資本結合在一起，促進了全球生產（Pun and Smith 2007）。就像我們之前說過的那樣，政府通過戶口制度，剝奪了農民工階級在城市居留的公民權。對於農民工來說，微薄的收入更是杯水車薪，他們根本無力支付在城市裏的住房開銷，於是工人們別無選擇，只能住進僱主提供的宿舍。對很多觀察者來說，中國是一個奇跡，不僅僅是因為中國經濟飛速發展，還因為雖然每年在城鄉之間移動的農民工有 2.7 億人之多，但是中國卻沒有因此變成「貧民窟帝國」。是什麼吸收了規模如此巨大的農民工群體呢？為什麼中國的工業城市沒有重蹈很多其他第三世界國家的覆轍，在快速工業化後出現貧民窟呢？宿舍勞動體制為我們提供了線索。在經濟特區和工業城鎮，宿舍的應用是廣泛而系統的，宿舍除

了為農民工提供暫時棲身之所外，也讓公司實現了對勞動的控制，因為工作空間和生活空間在資本和國家的推動下實現了高度整合。宿舍勞動體制產生了快速流動的勞動力，他們在城鄉之間來回穿梭，在工廠之間更換着工作。正是這種流動性讓資本控制了工人的生活空間，讓國家控制了人民的居住。因此宿舍勞動體制就掩蓋了貧民窟的存在，而貧民窟在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十分普遍。

要理解中國宿舍勞動體制的特殊形態和快速流動工人階級的形成，性別是關鍵。從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大批內地農民工湧向工業城市，新興的出口導向型產業首選僱用的是那些年輕的單身女性。她們是手指靈活、「溫順」、「馴服」的勞動主體，因此在工人中佔有較高的比例。在服裝、玩具和電子行業中，女工的比例甚至高達 70%，是她們形成了中國第一代農民工。那時候，單身女工的年齡大多在十八到二十五歲之間，她們每天能工作十四個小時，沒有週日和公共假期。那是資本的黃金時代，因為新工人階級尚能提供充足的、理想的、以女性為主的勞動力。

到了二十一世紀，因為在所有部門資本開始快速積累並擴張，偏愛女工的用工形式快速增長，所以女性勞動力很快使用完了。勞動力短缺的時代來臨了，特別是在 2004 年之後，用工愈來愈吃緊。以前，未婚男性被當成是不穩定的勞動力和麻煩製造者，但是現在，未婚男性也走進了工廠的大門。已婚

男女緊隨其後，儘管他們已不再年輕，精力也不再充沛，可能無法應付白班、夜班連軸轉的辛勞。如今在新興工業城鎮，因為用工吃緊，服裝廠、電子廠和玩具廠都將目標瞄準了男性和已婚女性。第二代農民工因此有了較為平衡的性別結構。在對出口導向型工業進行研究時，除了年齡和家鄉，性別也是不可或缺的視角，是不同性別的工人在為世界市場進行全球生產。在中國融入全球經濟的過程中，我們目睹了宿舍勞動體制的出現，目睹了不同性別打工主體的誕生，他們在特定的生產空間被性別化。中國工人的性別化呼應了全球勞動使用的女性化，後者在全球資本主義擴張和新國際勞動分工誕生的背景下出現。同時進行的還有微觀性別化的過程，正是在這一過程中，工人獲得了性別身份（Ong 1987; Kondo 1990; Lee 1998; Pun 2005）。

中國宿舍勞動體系的起源

中國宿舍勞動體制不僅僅是全球資本主義重構下的新的空間修復，同時，不管是在西方還是東方，在工業化進程中，宿舍式的用工形式都有着悠久的歷史（Pun and Smith 2007）。解放前，工業宿舍首先在上海的日資企業中出現，這與快速工業化時期的宿舍用工歷史遙相呼應（Smith 2003）。在南非等發展中國家，礦鎮也普遍使用宿舍為打工者提供住宿（Burawoy

1976, 1985)。西方國家、拉丁美洲國家、日本和韓國都在工業化早期使用過宿舍。¹

從中國歷史的發展來看，工廠宿舍第一次出現是在二十世紀初，規模還十分有限，那時帝國主義作為「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正將大量外國工業資本帶入中國。在對從世紀初到四十年代的天津棉花、絲綢工人進行研究時，賀蕭（Gail Hershatler, 1986）發現，外資企業通過僱用外地女工，並將她們安置在宿舍中，大大降低了自己的勞動成本。但是如果女工有選擇，她們還是願意跟親戚或老鄉住在附近，而不願意待在工廠提供的宿舍裏。賀蕭指出：

如果可以，天津作坊主更願意將工廠建成一個封閉的空間，由他們提供服務，由守衛進行安保。但是工人們卻用腳投票，反抗這種試圖將居住變成「訓規工具」的打算（Hershatler 1986：165）。

宿舍可以為那些沒有親戚和老鄉關係的單身女工提供庇護所，但是她們一旦在宿舍住下來，便不准再離開，在晚上還會被鎖起來（Hershatler 1986）。韓起瀾（Emily Honig）對三十

¹ 非常感謝克里斯·史密斯（Chris Smith），是他首先向我介紹了宿舍勞動體制這一概念，也是他提醒了我在日本、韓國、拉丁美洲和南非，也存在着類似的勞動體制。

年代上海棉紡女工進行過類似的研究，她也發現承包商會僱用幫手守衛宿舍，甚至在假期和非工作日也嚴加看守，結果女工不得不睡在一起，還要忍受承包商的性侵犯，擁擠的居住環境和惡劣的衛生條件。

裴宜理 (Elizabeth Perry) 在《上海罷工：中國工人政治研究》一書中也提到過，在解放前的上海，第一代工人主要由技藝高超的工匠組成：

首先……工人們被要求住在宿舍，但是工人數量很快超過了宿舍 1,500 人的容納上限，於是很多工人便搬進了附近的住宅。從同一個地方來的工人往往住在一起，工作在一起，久而久之在這家兵工廠形成了一個聯繫緊密的廣東幫 (1993: 36)。

裴宜理認為，雖然因為同鄉關係而形成的分化不會阻礙階級意識的發展，但是只有通過共處一室和共住一區，工人之間才能形成關係網，才能孕育集體行動。裴宜理在書中還記錄了解放前上海工人階級所扮演的反叛角色。

到了社會主義時期，城市裏的國企也開始為工人及其家屬提供宿舍。但是這時候，宿舍的性質已經發生了徹底的改變，因為工人全家都能住上政府提供的單元房，因此工人階級也被認為是享有特權最多的階級。社會主義時期的居住政治經濟學與當代截然不同，那時的「單位」就像公社一樣，為工人提供

工作、住房、醫療和教育等終身福利（Bian 2009; Lu and Perry 1997）。如今，社會主義「單位」體系已經在城市改革中分崩離析，改革也粉碎了社會主義時期建立起來的享有特權的工人階級。今天，中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國家控制戶籍制度，資本提供工廠宿舍，工人缺乏獨立住宿，在這些因素的綜合作用下，當代宿舍勞動體制變得更有支配性、更廣泛、更全面了，這樣的宿舍體制不管是在中國歷史還是亞洲歷史上都是史無前例的。中國今天的宿舍勞動體制是獨特的，因為宿舍的提供面向所有人，不分行業，不分資本類型，不分部門，不分地點。

因為家鄉缺少工廠，新打工主體才出來打工，他們在不同省市之間來回穿梭，在工廠和宿舍短暫停留。他們的流動性受兩大社會條件所塑造：第一，農民工有將勞動賣給全球資本或私人資本的「自由」，這兩種資本在後社會主義時期的中國是允許出現的；第二，國家通過制定法律來控制人口數量和人口流動，通過限制工人的自由流動來滿足跨國資本和城市發展的需求。這兩個社會條件在很大程度上是相互矛盾的，所以一方面農民工擁有在城市裏工作的自由，另一方面卻受到阻礙，不准他們在城市永久定居，不准他們發展成為新工人階級。宿舍勞動體制是全球資本主義與國家社會主義遺產雜交的產物，它重新連接了生產和日常社會生產，服務於全球資本積累。

勾畫現代宿舍體制

我們將以一家高級服裝廠為例，說明現代宿舍體制的運作。我們在 2003 年第一次來到中國銀光服裝廠，並於 2013 年對這裏進行了回訪。中國銀光服裝廠是一家位於上海的合資企業，由一名大陸經理和一個台灣家族企業共同擁有。公司成立於 1995 年，大陸經理負責日常管理和生產運營，台灣方負責從歐洲公司和日本買家那裏獲得生產訂單，確保續訂。中國銀光服裝廠主要生產服裝和內衣，生產所需的布料在大陸採購、印染。除了為買家供貨外，銀光服裝廠還生產自己的品牌內衣，在大陸銷售。

銀光服裝廠 30% 的產品銷往歐洲，買方要求服裝廠嚴格遵守相關規範。在全球分包鏈上，銀光服裝廠尚處於較高的位置。因為台灣資金的注入，公司可直接跟歐洲買家聯繫。跟建築業一樣，服裝行業也通過複雜的分包體系組織生產，一家公司的供應鏈和生產鏈往往遍佈全球。銀光服裝廠會將一些訂單，特別是涉及織物和編織的環節，分包給當地更小的工廠。儘管工廠管理層主要由大陸人構成，銀光服裝廠還是立志成為全上海最先進、最現代化的企業，立志達到國際標準。大陸經理用「走向全球」這句俗語來解釋公司的目標。人們認為只有放眼全球，才能保證公司通過引進先進的管理方法和國際化的勞動標準，在激烈的全球競爭中生存下來並實現發展。工廠經

理是一個樂觀、雄心勃勃的人，他饒有興趣地勾畫着一個全新的工廠管理範式。但是不管是在國內還是國外，長久以來中國工廠都是同「血汗工廠」聯繫在一起的。

既然中國銀光服裝廠打算進入全球生產的流通中，那麼對於工廠而言，資本積累空間生產政治的重要性就顯而易見了。2001年3月銀光服裝廠遷到了上海附近的一個科技開發區。該區由政府新建，旨在吸引外企、合資企業和私人投資企業來此進行出口加工。銀光服裝廠的新廠區表面上看起來很高級、很現代化，工廠新建了一棟三層的生產樓，一個附屬的管理區，一個獨立的單層食堂（帶有廚房）和獨立雜物間。在巨大的廠區（佔地約18,000平方米）內，有一片區域尚未使用，服裝廠計劃在此蓋上一棟現代化的宿舍樓，並配上先進的設施。因為建造了新廠區，服裝廠的所有權向大陸經理傾斜，經理擁有了公司70%的股份，而台灣方持有的股份則從50%下降到30%。

2003年，銀光服裝廠儘管已經擁有了先進的廠區，卻仍然缺少一棟滿足SA 8000標準和歐洲公司標準的現代化宿舍樓。歐洲公司對服裝廠進行了多次視察，加快了現代化宿舍樓的建設步伐。銀光服裝廠有僱員一千多人，這一數量有助於保留高質量的工人，公司也希望擁有相對穩定的生產力，建立即時補充的勞動體系，這就是為什麼銀光服裝廠要在廠內修建宿舍樓，因為這樣可以開展即時（just-in-time）生產體系建設。歐洲公司派出的特別工作組認為：

首先要盡可能快地建好宿舍。宿舍要達到國際標準，也要保證工人擁有較好的生活環境，這樣他們才能更好地投入工作。

從中我們可以看出，工廠管理的首要任務，是為生產而留住工人，預防工人離職。通過嚴格的管理，將勞動力「限制」在較好生活環境中的做法，其本身就是一種吊詭的管理策略，因為工廠打算留住的工人是具有流動性的、是不穩定的。在中國，外資企業和私營企業的工人離職率非常高，每年從 30% 到 90% 不等 (Smith 2003)。

勞動者的流動性不僅令管理層頭疼，也令中國政府感到非常棘手。從九十年代中期開始，每年都有數以百萬計的農民工如潮水一般地湧向城市，相關問題都需要政府處理 (Cook 2002, Fan 2003)。銀光服裝廠 90% 的勞動力都是來自於浙江和江蘇，剩下的 10% 是上海本地人，他們住在自己家裏。70% 以上的工人是女性。大多數工人都在二十五歲到三十五歲之間。因為新宿舍樓尚未建成，在公司，工人的住宿是一個敏感的問題。

空間分層不僅通過工資、職位和地位，還通過生活條件影響了勞動力分層 (Rofel 1999)。全球資本主義以空間差異性和等級性為基礎，在勞動生產和宿舍供應的微形式上有所體現，這在跨國公司的車間裏尤其明顯。管理人員、技術人員、

文職人員和生產工人在住宿條件上存在着巨大的差異，說明了空間分層的存在，這種分層進一步加強了勞動力分層。銀光服裝廠在三個地方租了套房和宿舍，其中兩居室的公寓給管理人員、工頭和辦公室文員居住，他們的住宿條件比生產工人要好得多。公寓裏配有餐廳、廚房、廁所和帶熱水的淋浴間。工廠還從政府那裏租了住房，作為工人宿舍，每間宿舍可容納八至十六人。這裏的生活條件十分惡劣，難以達到歐洲公司的最低居住標準。宿舍裏沒有廚房和淋浴；平均十多人共用一個廁所，而且廁所的衛生條件也不達標。宿舍裏沒有適飲水，工人只能到一樓購買。工廠沒安排消防演習，宿舍樓裏也沒有應急燈，滅火器要麼不存在，要麼根本就不能使用。

跟公司標準相反，工人根本沒有存放衣服和私人物品的空間，所以他們只能將這些東西掛在床頭。宿舍裏沒有風扇，甚至在頂層的十六人房間裏也是如此，一到夏天這裏的溫度就居高不下。有些宿舍甚至沒有熱水和淋浴，工人只能去公共澡堂洗澡沖涼，每次五塊錢。在歐洲公司的施壓下，服裝廠向我們展示了宿舍的平面設計圖，這張圖是由建築公司和設計公司按照歐洲公司的標準進行繪製的。

2013年，當我們再次來到銀光服裝廠時，高級宿舍樓早已建好並投入使用。宿舍區就像學校一樣，有一片空地作為操場，宿舍樓每層都有走廊，還有整潔的客廳。現在，每間宿舍住四到六人，每人一張床，宿舍還提供照明、存儲空間、公共

廚房、廁所、淋浴、風扇和熱水等設施，甚至還裝了空調。宿舍樓一樓是圖書館、診所和娛樂室，供所有工人使用。公司以為有了更好的設施，就能夠留住更多高質量的勞動力，留住更多經驗豐富、技能高超的勞動力，並從中獲利。但是這麼多年過去了，事實證明一棟漂亮的宿舍樓是留不住勞動力的。

在銀光服裝廠，工人的平均工作年限是兩年。保證勞動力的穩定和自律，依然是工廠管理的重中之重。因為工廠勞動力尚且年輕，工人的頻繁更換有助於降低工資水平，所以工廠留住勞動力的目標顯得有些自相矛盾。因此，「老員工」也不過是多待幾年而已，工廠並不希望改變外來務工人員的人口構成。正如我們之前注意到的那樣，工廠提供的額外福利是用來對日常勞動進行約束的，以便能更好地滿足生產需要和市場需求。一位已經在這裏工作了三年的工人告訴我們：

我在工廠算是老工人了。剛開始選擇銀光服裝廠是因為這裏工作條件好，但我逐漸意識到，每月就發這麼點工資，我永遠不可能將家人接到上海生活。好看的宿舍又有什麼用？我還是得跟家人分開。

對於很多工人來說，工廠之所以修建現代化的宿舍，並不是為了工人着想，而是為了應付跨國集團的檢查，檢查團總喜歡拿着核對表、一項一項地檢查工廠的設施是否到位。通過設計和建造專用的現代化宿舍，工廠可以實現對工人業餘生活的

控制。負責工廠設施的經理這樣解釋道：「公司可對宿舍進行更多的監管和檢查。住在宿舍，女工也能得到更好的保護。」他接着說：「男性工人晚上是不允許在街上亂逛的，宿舍也能更有效地控制吸煙。」儘管男女工人的居住條件類似，男工和女工還是被嚴格地分開，以便工廠控制工人的性行為。

工廠希望工人能對宿舍實行自我管理，這樣工人也能學習如何自律，如何保持生活環境的整潔。從福柯理論的角度來看，工廠之所以通過現代宿舍體制為工人提供較好的生活條件，是因為這樣可以對工人的身體和主體性進行長期監控（Foucault 1977）。從唯物主義的角度來看，工廠對宿舍的投入愈大，就愈渴望對其進行控制。更乾淨的生活場所、更私人化和個人化的空間、通風條件更好的房間都指向了一種現代的工業存在形式，一種單向度的人，這種人非常適合為世界級知名服裝品牌進行生產。工人們為了生活條件的改善也付出了代價，那就是生活在隱形的監控之下。隨着工廠不斷加強對工人業餘生活的訓規權力，工人不得不放棄流動的自由。

中國銀光服裝廠的現象並非個別例子。在中國，隨着農民工的數量達到總生產力的90%，他們的住宿成了一個棘手的管理難題。近幾年，愈來愈多的公司開始摒棄過去以懲戒為目的的罰款體系，轉而實行積極的獎勵機制。管理人員想像並勾畫了一種現代的宿舍勞動體制，來適應跨國語境下的全球化生產。這說明對於宿舍勞動體制來說，為了與國際市場接軌，資

本最常用的策略之一就是通過遵守行為規範、達到國際質量標準，接受跨國資本的合理化邏輯。

宿舍勞動體制和中國新工人階級

中國城市的工業空間景觀由宿舍勞動體制塑造着，宿舍勞動體制又導致了成千上萬的大型建築被暫時用作工人宿舍。宿舍空間集生產、居住為一體，可被自由支配，也可被替換。這決定了宿舍空間的生命周期較短，形成了工人階級匆匆過客的特徵。同時，短時性也成了工人階級在很長一段時間內的特徵。儘管單棟宿舍樓和單個工人只在較短的一段時間內存在，但短時性已經成了他們的本質，宿舍空間遍佈中國的大城小鎮，擴張趨勢仍在延續。八十年代初，中國在南方成立了四個經濟特區，這些新興工業區以出口為導向，以外企為主導，非常依賴住在宿舍裏的農民工。九十年代中期，工業區隨着中部和北方的工業城鎮興起而快速擴張。到了二十一世紀，大多數城市都成了「世界工廠」，為國內外市場生產貼着「中國製造」標籤的產品。隨着數以百萬計的農民工湧向工業城鎮，工人的住宿成了企業必須要解決的問題。在全球資本積累的過程中，通過對工作空間和居住空間加以改造，宿舍勞動體制成了保證兩代新勞動階級用工的關鍵。

儘管宿舍勞動體制已經成型，我們還是看到了企業通過多

種形式來管理工人住宿。下面以深圳的一個工業區為例，對此進行說明：

1. 企業租用宿舍：企業從政府或個人手中租用住房，作為工人宿舍。這是深圳最為常見的宿舍形式，也佔宿舍總數的大多數，特別是在工業區周邊更是如此。這類企業通常是中小型企業，約有僱員幾百至上千人。宿舍的居住條件一般存在着巨大的差異。每間宿舍可住八到十二人，2014年的宿舍租金達到每人每月100到150元，這一數字可能包括也可能不包括設施使用費和其他開支。宿舍裏，盥洗室、澡間和飲用水設施都是共用的。大多數企業擁有職工食堂，分包給家庭小作坊負責。

2. 企業擁有宿舍：這類企業通常是大型企業或跨國企業，它們通常會購買土地使用權，然後自建宿舍樓，由地方政府或私人開發商負責建造。這類企業通常擁有僱員上千人，因此公司至少需要建造五、六棟宿舍樓。宿舍樓的結構跟醫院或者學校類似，每間宿舍約30平方米，可容納八至十二人。有些企業提供免費住宿，有些企業則收取100元/月/人及以上的住宿費。同樣，所有的生活設施均需共享。跨國公司通常還提供公共休息室。

3. 工人自行租房：如果宿舍供給不足或者工人已婚，工人就會從當地村民那裏租房居住。每間房的房租約500至600元/月（2014年），通常由兩到四人分攤。一套三居室的公寓通常有六到十二名工人同時居住。這種宿舍通常還包括廚房和餐

廳，但是工人們實在太忙了，所以基本沒時間做飯。工人雖然租了房，但是他們不會像對待自己家那樣對待這裏，他們只會把這裏當作宿舍，一個臨時居所而已。

但是，宿舍空間的多樣性和複雜性，無礙於新工人階級的存在：作為農村主體，農民工的城市居住權是無根的、不穩的。農民工的命運在宿舍勞動體制中體現得淋漓盡致，在這裏，日常勞動再生產以最基本的形式存在着。只要住在集體宿舍，工人就等於把居住權交給了資本，形成了農民工的暫時性。農民工對於資本來說只是暫時的、一次性的。但這兩種性質卻有助於資本不斷榨取工人的勞動價值。不管工人何時離開、走到哪裏，宿舍勞動體制都等着她或他。城市中無處棲身？不要緊，公司會幫助你。只要還能壓低工人工資，只要工人還得承受城市高昂的居住成本，公司便很樂意為農民工提供住宿。就算資本沒有刻意創造宿舍勞動體制，宿舍也成了資本榨取勞動力、壓縮勞動成本最有效、最有力的空間。

在大多數新興城鎮，剛開始是由政府將配有宿舍的工廠租給廠主的。工廠一般不會為家庭提供住宿，資本對勞動者的下一代再生產不感興趣。資本關注的是如何通過控制勞動力的日常再生產，將臨時工、農民工和合同工的勞動使用最大化。外企建造的工廠宿舍樓一般都是多層建築，這樣的居住空間極具集體性。拉上簾子，床鋪就是工人唯一的隱私空間。但這仍不能解釋宿舍作為一種生產方式所扮演的角色，不能解釋因生活

和工作合二為一而導致的工人雙重異化。

農民工被迫向家人、家鄉和農村生活告別，然後來到車間，臣服於個人化進程。管理部門將農民工看成「工人個體」，認為他們缺乏集體聯繫的紐帶，要為自己的行為負責。到目前為止，農民工與工廠之間的聯繫多是短期的、以合同為基礎的，勞動的異化主要不僅是來自於勞動同產品所有權的分離、勞動者生產技能的缺乏，更甚者，宿舍勞動體制讓農民工與自己的過去相異化，他們告別了傳統的農村，來到了異地的工廠，面對着不熟悉的他者、聽不懂的語言、吃不慣的食物和首次接觸的生產方式和產品（Smith and Pun 2006），因而農民工的異化感同時來自於生產和再生產兩個領域。如果說青年馬克思強調的是資本主義生產關係中的異化，我們可加以補充：宿舍勞動體制通過進一步切斷了農民工與家庭、村莊、集體之間的紐帶，在再生產領域造成了雙重異化。

因此，大批農民工在很多方面被隱性地邊緣化了，他們形成了不穩定的（precarious）工人階級。因為在城市裏沒有居留權，所以農民工找工作的首要條件就是提供住宿。雖然戶籍管理制度有所鬆動，農民工的工資依然不足以支付他們的城市生活成本，農民工很難在城市中生活下去，這進一步拉大了階級之間的差異。宿舍勞動體制是戶口制度的一種特殊表現形式，通過將工作空間和宿舍合二為一，對農民工進行控制。在新興

工業區，宿舍勞動體制成功地抑制了農民工工資的增長，延長了他們的勞動時間。

在過去的二三十年中，中國就是這樣保持廉價勞動力的比較優勢，實現經濟快速發展的。以富士康為例：2010年5月，富士康位於深圳的兩個工廠共有生產工人45萬人，這一數字佔富士康大陸勞動力總數的一半以上，工人每週工作40個小時，卻只有900元的工資。這種溫飽等級的工資是無法滿足工人的需求的，工人被迫加班，每月累計加班100個小時，是《勞動法》（第41條）中規定加班上限36個小時的三倍。總的來說，中國製造業工人的工資只有美國的百分之一，即使跟經濟起飛初期的日本、韓國和台灣相比，中國工人的工資仍然很低（Hung 2009）。

除了縮減勞動成本，宿舍勞動體制也影響了外企和私企的管理體系。通過宿舍勞動體制，公司對勞動力實行嚴格的控制。通過規定工人必須住在宿舍，根據生產需要增加工作時間，公司實現了對勞動時間的彈性利用。與政府規定工作時間和工人自行決定工作時間相比，彈性工作時間更有利於僱主響應產品要求。正如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中指出的那樣，工作日長度可以在社會和身體能夠接受的限度內進行調整（1990 [1867]），通過宿舍，僱主可以對「社會」限度在很大程度上進行操控。跟一般工作所導致的「正常」工作與家庭分離

相比，宿舍勞動體制對工人的工作時間和業餘時間施加了更廣泛的控制。²

小結

我們永遠不會否認資本在影響全球資本主義版圖和當代危機方面的重要性；但是我們希望「勞動」和「階級」分析能夠回歸，能夠以第三世界的視角回到全球資本主義空間政治的中心。中國形成了二億多農民工的新工人階級，在塑造全球經濟方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為審視當代全球資本主義的空間性提供了寶貴的非西方視角。通過深入探尋作為新生產空間政治的宿舍勞動體制，我們發現，在資本積累和跨國生產全球化的驅動下，宿舍勞動體制為中國崛起成為世界工廠奠定了基礎。有趣的是，我們看到了泰勒制和福特主義（大規模生產線、大眾政治組織的出現和福利國家的干預）與各種形式的彈性積累（彈性生產、臨時工、國家退出而導致的去管制化和私有化）的完美結合。泰勒制或者彈性生產範式，這些都不足以解釋中國生產的多重空間性。在珠江三角洲，成千上萬的只有一兩千僱員的外資企業被認定為中、小型企業。在服裝業、製鞋

² 在社會主義時期，企業被稱為「單位」，為工人提供終身住宿。關於工人福利，單位不會延長工人的工作時間。

業、玩具業和電子製造業，每天有上萬人在大型生產線前進行着密集生產，這樣的情景已成常態。在長江三角洲，僱員超過一萬、一萬五千人的工廠比比皆是，而且這些工廠不是獨立存在的，每家工廠背後都跟着一大批只有一兩名勞動者的家庭作坊。將各種各樣的靈活生產體制與傳統泰勒制相結合的高度複雜的生產方式，是由宿舍勞動體制所主導。

因此，當下出現的是這樣的跨國生產的政治經濟：它不僅跟新的經濟的規模緊密相連，還跟新的規模的經濟有關，在這種政治經濟中，為實現全球範圍內的資本積累，被多重空間化的勞動力受到了無所不用其極的操縱（Pun and Smith 2007）。在這種空間佈局下，中國宿舍勞動體制顯得十分突出，這種資本策略是效率最高的、最具主導性的，與全球即時生產配合得天衣無縫。如今，通過要求供應商提供「即時」產品，蘋果、迪斯尼、三星等公司終於實現了零售「零庫存」。宿舍勞動體制可在生產中將工作空間和生活空間合二為一，有助於公司實行彈性工作制，強迫工人加班，從長遠來看，這是工廠在適應不斷變化的全球商業慣例。如此看來，宿舍勞動體制的基本特徵包括：工作和居住高度結合，生產和日常的社會再生產為了全球資本使用而重組，勞動力的日常再生產完全被外企或私企所操控。

總之，形式多樣的宿舍勞動體制，維持了快速流動的勞動力數量以及未能完成的無產階級化進程，這影響了中國新工人

階級的形成。但畢竟，宿舍勞動體制為新工人階級奠定了結構性的基礎，這是解釋當代中國的新工人階級政治的處於轉變中的空間政治。

由此看來，新農民工階級發起的豐富的、異質性的、多場所的抗爭，再也不能以官方說法中的「階級鬥爭」來進行描述或政治化論述了，因為階級主體感受着、理解着、回應着、籌劃着他們在當代中國的生活軌跡。當然這並不意味着階級分析因為階級語言在追求「全球化」的中國的國家和資本的霸權話語中被稀釋，而變得過時了。階級分析作為一種社會抗爭的武器，只能通過植根於來自底層的階級經歷而被重新激活，並發揮作用。來自底層的階級經歷就是宿舍勞動體制下的日常微觀政治，在這種體制中，中國工人同資本主義和市場進行抗爭。中國新工人主體不得不在實體空間中，去體驗自己的階級經歷，並將其變成生活鬥爭的一部分。在宿舍裏，工人們可以面對面地交流煩惱，交流對未來有限發展的感受，分享憤怒和沮喪，籌劃有組織的行動，這一切都讓工人對抗抽象資本成為可能。生產空間和再生產空間相互靠近，這種情況配置了新工人主體，雖然過程困難重重。在全球資本主義和中國現代性進程的十字路口，新工人主體出現了。他們的出現引發了人們在工人宿舍空間回歸「階級分析」的渴望，因為工廠集體宿舍正是工人感受自身複雜性和生活中種種矛盾的地方。

現，對不公道的控訴卻往往能觸及勞資關係的核心，例如，建築業在改革時期經歷了資本性質和產業結構的快速轉換，形成了新的生產關係。「沒有老闆」和「沒有勞動關係」的政治經濟學含義，資本與產業、管理和勞動的脫節，都直接與勞動分包體制的剝削本質有關。所有的勞動抗爭都源於建築業政治經濟背景的變化，因此具有階級鬥爭的性質。

宿舍工廠體制下的工人罷工

讓我們先暫停對建築工人的討論，關注一下工廠工人，從中理解宿舍工廠體制下工人集體行動的動員和發展，以及工人的訴求。在中國，很多農民工都在為跨國資本或國內資本服務，新農民工階級的崛起引發了新一波呼籲勞動權益保護的抗議。據觀察，每年都有很多農民工為了更好的生活來到城市。但是他們很快便失望了，義憤填膺或憂心忡忡，滿是委屈，最後採取直接行動。工廠農民工何時、以何種方式參與集體鬥爭呢？他們的委屈和不滿又是什麼？他們如何理解自己與資本和國家之間的對抗呢？他們如何利用底層經驗增強階級團結呢？

讓我們回顧一下第四章中阿辛的故事吧。宿舍勞動體制下不斷深化的半無產階級化進程，正是我們認識阿辛時的社會背景。2007年2月，阿辛還在深圳一家為迪斯尼供應玩具的工廠工作。當我們遇見他和幾位同事的時候，他們正通過一系列

的集體行動，為工人爭取利益和權利。從那時起至 2008 年，阿辛和同事們的生活便失去了寧靜和舒適，他們在深圳經濟特區進行長期鬥爭，抵抗工廠搬遷，爭取合理賠償。就像阿辛的故事告訴我們的那樣，公司管理層只想留住管理人員和監管人員，所以主要說服他們遷往新廠。管理層還想留住那些「忠誠」的員工，就是工作五年以上的老工人。當然，只有少數人想去新廠，大多數人都不願在沒有補償金的情況下離開公司，因為去了新廠工資就少了四分之一。抗爭開始後，工人都不用加班了，因此有了更多的時間待在寢室，有了更多的機會商討加班補助相關事宜。他們閱讀深圳政府頒佈的勞動法規，討論法律問題。一些工人則開始搜集、記錄公司違法的證據，涉及付款、押金、工作時間、工作環境、合同和社保等方面。在宿舍裏，工人開始組織集體會議，構建關係網絡。當得知公司存在諸多違法行為和違規操作時，他們憤怒了。通過宿舍組織，工人們很快便意識到了公司做法和法律法規之間的差距。激進的集體行動遲早要發生。宿舍作為工人紮根、進行聯絡的場所或戰場，為階級形成和勞動組織帶來了全新的可能性，並對國家和全球資本主導下的抽象空間發起了挑戰。宿舍勞動體制包含了所有的控制和抵抗，激發了農民工根植於底層階級經歷之上的日常集體鬥爭。

我們認識阿辛的時候，他和四個同事已經離開玩具廠了。H 玩具廠有六百名工人，採用典型的宿舍勞動體制。80% 的工

人住在工廠宿舍裏，其餘 20% 住在附近的農村裏，享受租房補貼。2007 年 2 月阿辛離職時，已經是一名技工了，擔任模板部的領班。為了參加集體行動對抗公司，在為這家工廠工作一年後阿辛便辭職了。他回憶了當時的情形，說道，當他最後一次走出工廠時，發現自己既無路可進，亦無路可退。他在這個工作了十年的城市裏迷失了，那時他的事業才剛剛有點起色。中國農民工普遍面臨着困境，在我們在深圳和東莞研究過的工人中，已經工作了十多年的工人仍然沒有機會留在城市。在大城市工作的時間愈長，他們就愈能意識到自己在社會層面和空間層面所受的排斥。農民工中的一些人在為工廠打了幾年工後，能夠通過轉型為小店主、小商販或清潔工，繼續在城市逗留。但是他們仍是城市中的匆匆過客，幾無成為市民的可能。這便是中國城市政治空間的本質特徵，中國無產階級化的過程永遠無法完成，第一代和第二代農民工都感受到了這一點（Pun and Lu 2010）。

2007 年初，當阿辛發現工廠準備搬出深圳以降低生產成本時，他就開始動員工友，展開了一系列的集體行動。儘管在車間受到嚴密監控，阿辛和同事還是利用狹小的宿舍空間，頻繁召開會議，將宿舍變成了即將顛覆整個工廠的指揮部。據阿辛回憶，在進行了激烈的討論後，模板部的三十名工人一致推選阿辛和其他四位工人，作為代表起訴當地的勞動局，指控他們

漠視工人的需要，沒能執行那些保護勞動者的行政法律措施。¹

這五位工人就是後來的「維權五君子」，著名的勞動維權鬥士。五人中，只有阿辛來自河南，其餘四人來自其他地方，包括湖南和江西。五人都在手板部上班，而且都已幹到了模板師傅的位置。儘管宿舍經常爆發熱烈的討論，工人們還是相信他們。五人都年過三十，其中年紀最大的老黃已經在這家工廠工作了五年，每個月可以拿到 4,200 塊的工資。阿辛只在這工作了一年，工資每月 2,200 塊。

工人因與管理層之間存在着矛盾而緊密地團結在一起，成了鬥士，而同住一間宿舍有助於工人進行組織動員。下班回到宿舍後，五位代表常常一起聽廣播，尤其是收聽有關法律和打工的節目。阿辛說，聽廣播對他們來說是一種「啟蒙」，他們從中學到了不少知識，包括企業不簽訂勞動合同是違法的，加班應該獲得雙倍或三倍的工資等。

2007 年 2 月 12 日，五位工人開始了行動，宣佈工廠非法運營。他們向工廠提交了一封公開信，要求「集體解除勞動關係」，理由是工廠沒有跟工人簽訂合法的勞動合同，而且沒有

¹ 集體行動剛開始時，大家準備的是提起法律訴訟，而不是發動罷工，因為手板部的工人沒有足夠的自信組織全廠罷工。但是行動開始後很快升級為罷工。

依法支付他們的社會保險金，此外還強迫工人超時工作，沒有為每天的加班及節假日加班支付加班費等。同時，阿辛和他的工友還敦促當地勞動局的官員幫助維護工人的合法權益。他們尤其提出勞動局應當確保工廠依照勞動法縮短工時，同工人簽訂合法的勞動合同，為工人繳納社會保險，為2007年1月和2月的超時工作支付加班費等。尤其引人注目的是，五位工人要求工廠支付過去兩年的累積加班費，總額達65萬元人民幣。對於上述要求，工人們的表達很清楚：

工人每月至少工作28天，每天至少13個小時。加班費只是在每天工作超過9小時以後才開始計算的。不但如此，工人每小時的工資低於法定工資1到1.2元。對於計件工人而言則根本沒有加班費。以老黃為例，2006年12月他工作了227個小時（屬於「正常」上班時間），外加114.5個小時的加班。2007年1月，他工作了266個小時，外加87.5個小時的加班。老陳2006年12月工作了269.5個小時，加班77.5個小時。

工廠搬遷是工人集體行動的催化劑。此前工人在車間不斷累積的憤怒、挫折和不公平感彷彿一下子找到了爆發點。工人們擔心工廠搬遷後可能會裁員，更擔心搬遷後追討加班工資會難上加難，這促使工人們採取行動。老黃說：

我們是工廠裏少數比較核心的熟練工人。我一個月可以掙到四千多塊，這不是一筆小數目。我不用擔心吃喝問題，但是我們缺乏安全感，也沒有一個體面的個人地位。儘管我們把青春和汗水獻給了深圳，但是我們還是沒有應有的地位，而且最終來說是召之即來、揮之即去，隨時可以取代的。當我們老了，得了慢性職業病，然後回到老家，然而我們既沒有養老金，又沒有健康保險，到那時我們該怎麼辦？

老黃說得很清楚，他並不是對工作條件或工資水平不滿，他擔心的是未來，是既沒有安全感又沒有尊嚴的職業前景。作為一個隨時可被取代的勞動者，他知道自己的位置是很脆弱的。當他老了，可能會被工廠拋棄，可能遭受慢性職業病的折磨，可能不得不回到老家。是既無前景又沒尊嚴的職業生活激起了他的憤怒和不平。

這五位工人沒有別的選擇，只能採取行動。他們正值壯年，都達到了自己職業生涯的高峰，等待他們的將是不可避免的下坡路，或者是被更年輕的工人所取代。他們都明白，自己積累的技能最終會被別人學會。工廠毫無回應，在這種進退兩難的處境下，他們別無選擇，決定採取激進行動。在要求勞動局判令工廠賠付未果後，他們很快將行動的目標從工廠轉到勞動局身上。五位工人充分利用互聯網查詢相關信息，很快便得

知當地勞動局有責任監督勞動條件，處理勞動糾紛。

在進入起訴階段的同時，這家迪斯尼供應商的六百名工人（其中多數是女工）也組織了一次罷工。2007年5月，該廠同工人簽訂了一份短期勞動合同，並正式宣佈將於年底搬到東莞。9月，工廠女工團結起來組織了多種形式的抗議活動，包括集體停工、抗議、撤回勞動合同等。他們要求工廠支付拖欠的加班費，要求經濟賠償，要求公司補交他們應得的社會保險金。² 工廠解僱了一些工人，當他們拖着行李走出工廠宿舍時，抱怨說「老闆們沒一個有良心」。

被拋棄的感覺不僅在離廠女工那裏非常強烈，在那些留下來的工人中也很普遍。工廠管理層態度強硬，他們表示根據《勞動法》，只需提前二十四小時通知工人就可以終止勞動合同，因此無需支付補償，多發一個月的工資已經是給予恩惠了，不是工人應得的。所以儘管有些工人已經在工廠工作了六年，他們還是應該高興地離開。這種說法令女工們更加憤怒。

同年7月，五位工人第二次向法庭提起訴訟。他們提交了一份詳細的報告，來說明勞動局對糾紛進行了不當的處理。他們要求法院推翻一審判決。更重要的是，他們堅持要求經濟補償，要求有保護自己利益的權利：「我們並不指望能贏得了政府，也沒有指望能要回所有補償。但是我們希望能探索一種新

² 見《南方都市報》，2007年9月12日。

的可能性，探索一條保衛我們自己權益的新道路，並且希望這條路對其他工人能有所幫助。」³

2008年4月，在等待法院判決結果達一年之後，五名維權工人中的三人——阿辛、老黃和老陳——最終決定去北京上訪。他們希望能從中央政府那裏尋求幫助，這也是他們最後的機會了。老黃說：「去北京是最後一步。我們幾乎把所有能想的法子都用過了。現在這是最後的辦法了，我們不想就此放棄。」他們在北京待了五天，在此期間他們去了勞動社會保障部，去了全國人大的信訪辦公室，去了最高人民法院、國務院和全國總工會。⁴然而結果卻令他們絕望。儘管如此，阿辛和老陳還是認為他們的北京之行是值得的，因為在信訪辦公室排隊幾小時被驅逐之後，他們也意識到了只能靠自己。老陳說：「我對社會已經完全失望了。其實來之前我還是抱有一絲希望的，現在我們死心了。」工人的怨恨政治變成了一種絕望，和一種對無力、無助感的真正理解：「我們只能靠自己，不能信政府，不能信公司，我們要的只是一點公平而已。」

3 見《南方都市報》，2007年7月25日。

4 中華全國總工會是政府領導的工會組織，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唯一的官方全國性的工會聯合會。

本章通過探尋農民工的集體行動，說明了新工人階級形成的現實性和複雜性。我們認為，近幾年大多數集體行動均涉及生產中工人同公司之間的矛盾，且都是工人在宿舍裏組織的。工人在行動的時候往往會湧向街頭，走上高速，包圍辦公大樓，封鎖公司入口或政府大樓。他們吸引了媒體的注意，也招來了警方的鎮壓。因為這些行動直接對資本和國家機器的統治發起了挑戰，因此從本質上講，它們既是經濟性的，也是政治性的。

面對國內外資本同地方政府的緊密結合，權利受到侵害的中國工人在形成有力組織、維護本身權益等方面，遇到了巨大的阻礙。但是，我們已經記錄了他們在宿舍勞動體制下面對嚴酷鎮壓不斷開展的自發式罷工和規模不斷升級的鬥爭。就像我們之前說過的那樣，宿舍勞動體制的形成，對中國轉型成為世界工廠、新工人階級的崛起至關重要。宿舍體制的整個邏輯並不僅僅是為了維持嚴格的規訓和懲罰，而是為了創造一種自我規訓的話語，這一點在車間內被反覆強調。宿舍勞動體制體現了一種福柯式的內化監視，設置了一系列的規訓性規範，對日常生活進行隱秘監視和小心謹慎的自我監管。簡言之，創造出訓練有素的自我規訓的勞動力，從而實現生產最大化，這就是宿舍勞動體制的「政治技術」。正是在宿舍裏，新工人階級被肢解、被壓縮、被替換——在全社會吞噬階級話語的霸權籌劃孕育了勞工鬥爭，而宿舍正是這一鬥爭的微觀戰場。

但是，凌駕於宿舍生活之上的福柯式權力技術，並不一定會塑造一批規訓化的勞動力。在霸權即將宣告階級在中國的死亡之際，工人卻對強加於己的話語性、結構性約束展開反抗，這些約束包括新自由主義，全球逐底競爭生產策略，社會主義戶口制度，模稜兩可的農民工身份，宿舍勞動體制。實際上，沒有一個工人真正遵守車間和宿舍規定。新打工主體無法依靠國家保護對抗工業全球化，只能積極改造宿舍空間，變為己用。擁擠的宿舍和深入的互動可能帶來矛盾，但是同宿舍、「共命運」，也將大家的工作生活緊密地交織和聯繫在了一起。在宿舍裏，在日常生活中，來自同一地方、擁有親戚關係的農民工常常聚在一起。他們也常常依靠老鄉和親戚的支持。這些關係網有助於農民工進行流動、尋找工作 and 交換工作信息，也有助於工人更好地面對工廠生活、克服城市生活中的困難。儘管從僱傭、培訓和規訓的角度來看，這些關係網有利於工業資本，但它們也奠定了工人聯絡的基礎，有助於工人適應陌生的環境。工廠利用關係網進行員工培訓、實現技術升級、加快適應工廠生活，也讓更多的工人知道了集體的力量，這種力量不僅僅關乎親屬、種族、性別，也涉及階級（Pun 2007）。

在這個危機、罷工頻發的年代，工人很容易將這些從老鄉網、少數族裔聚居區和集體中獲得的「軟」支持，在宿舍裏變成產業鬥爭所需的「硬」資源。在我們收集的一些案例中，請願信從一間宿舍傳到另一間宿舍，一晚上就能收集所有的簽

名。當工資拖延、身體懲罰、人身侮辱和失業發生時，工人正是在宿舍這一微型空間中商討對策的。宿舍很容易將工人們組織起來，對抗公司，因為在「共同抗爭」中沒有異見者存在的空間。即使沒有工會或勞工組織等正式組織幫助，在宿舍裏，工人也能高效地組織起來，並自發參與罷工。

讓工人對宿舍勞動體制滿意是極其困難的，這一問題從第一代農民工一直延續到了第二代。在宿舍勞動體制下，生產所需要的壓縮時間策略，其實也有利於縮短工人的組織時間，進而也縮短了工人達成共識、確定策略的時間。為了對抗物化，工人沒有其他選擇，只能保衛自己，通過在生活世界中實現自己的價值，拒絕被當成抽象的勞動。工人的生活世界擺脫異化，其關鍵在於宿舍，公司提供的宿舍是新工人主體的庇護所。我們在宿舍裏目睹了在地化的抗爭，宿舍不僅僅是工人跟資本對抗的戰場，也是發展新階級意識的爭論場所，因此儘管資本和國家的霸權性力量設下了重重障礙，新工人階級還是形成了。

而且我們也觀察到，年輕的農民工已經展現了在組織方面快速學習的能力。在同一工業區，只需幾個月他們就能以一組工人領導另一組工人的創新方式，勇敢地發起行動了。同樣，在擁有四十萬工人的富士康深圳龍華工廠，一位生產經理說：勞動矛盾和小規模罷工「每天都在進行」，幾乎「難以計數」。這說明工人學會了組織的技巧，並逐漸認識到只有通過聯合反

抗，才能實現基本權利。在深圳，一位湖南的年輕打工妹任芳向我們解釋了，在農民工為緩解大家不滿而鬥爭的過程中，階級意識和團結是如何增強的：

我不知道這就是罷工。一天，同事們紛紛放下了手頭的活，跑到操場上集合。我跟着他們。他們爭論不休，是關於加班時間瞞報和加班工資克扣的。半天之後，公司人力資源部的經理終於同意進行檢查。晚上回到宿舍，「大姐」跟我說，我參與了罷工！

在宿舍勞動體制下，年輕工人或新員工的勞動意識得到了增強。包括阿芳在內的多位富士康工人，其中很多人不過十六七歲，向我們講述了他們第一次參加集體行動的經歷。如果對於某些工人來說，罷工和參與罷工的話語還是全新的話，那麼對於其他大多數人來說，這種語言早已不再陌生。較高的農民工流動性有助於工人之間分享集體抗議和罷工的經歷，有助於新一代農民工培養階級意識。

但是，工人對抗公司的結構性弱點也十分明顯：中國嚴格限制集體談判權，即組織權和罷工權，地方政府則極力保證生產，保證就業。但是在車間裏和市場中，農民工確實擁有結構性的談判力量。到目前為止，這種力量主要是通過自發罷工和騷亂的形式展現的，工人直接繞過了代表公司和地方政府利益的官方工會。蘋果和其他巨頭公司對新型號的產品有時效性

的要求時，工人們則敏感地抓住了機會，在宿舍、車間和工廠裏頻繁集會，及時地提出自己的訴求。工人們反應迅速，利用暫時的勞動力短缺來提高自己的工資，並已取得了一連串的勝利。

儘管有組織的階級運動處處受限，農民工卻經常通過各種方式表達不滿、尋求改變，包括工廠罷工、停工、勞資雙方進行工資和社保談判、集體抗議、向媒體透露信息或向國家機器求助等（Qiu 2009）。農民工在建築工地進行的抗爭，是為了討回被拖欠的工資，是「底線」抗爭，這充分揭露了分包體系的殘酷本質，以及政治法律體制在保護農民工基本勞動權益方面的失敗。建築工人不難理解勞動分包體系的剝削本質，因為他們經常遇到工資拖欠、工傷無法得到賠償的情況。工人對「沒有老闆」和「沒有勞動關係」的反抗不再屬於法律範疇，而是法律話語掩蓋下的階級問題。

在這個快速變化的社會裏，集體行動導致了憤怒和暴力，有時也形成了合法行為和非法行為的混合體。當侵害工人們基本權利的行為受到法律保護時，工人行動便以維權的形式出現。但這並不意味着「法制社會」或法制主義的霸權話語已成功紮根於中國工人的內心。相反，一旦發現法律沒有站在自己這邊，工人對法制主義的堅信不疑就成了一把雙刃劍，信仰迅速坍塌。工人進一步發現不僅自己的基本勞動權不受法律保護，連他們自己也被法律拒之門外。一旦意識到法律武器「毫

無用處」，工人就會進一步地發動大規模罷工或跨廠抗議。

湯普森 (E. P. Thompson) 曾經說過，「當一批人從共同的經歷中得出結論（不管這種經歷是從前輩那裏得來還是親身體驗），感到並明確說出他們之間有共同利益，他們的利益與其他人不同（而且常常對立）時，階級就產生了。」(Thompson 1966) 在中國的新工業區，階級語言被吞噬了，集體行動依然缺乏正式的政治綱領來對抗資本和國家聯盟，但是這並不意味着長此以往在這個快速變化的社會中，「以利益為基礎的」或「以階級為導向的」集體行動不會演變為政治運動。新生代工人在九十年代學會了組織技能，形成了集體意識。在此基礎上他們認識到為了抵抗資本剝削，不能靠法律，不能靠政府，只能依靠自己。我們已經看到了第二代農民工的自我意識、滿腔怒火和集體行動，也已經注意到了位於管控、宰制的網絡中心的他們，只能通過談判表達自己的能動性。儘管在結構上存在着重重障礙，新工人階級依然像變魔術一樣發動了大量日常和集體暴動，對資本產生威脅，讓國家更急於去征服他們。階級的對立加強了集體認同，反之亦然。通過參與集體行動，農民工不再是單個車間或生產小組中的原子化個體了。當參與其中時，他們通過日常經歷，形成了認同和階級意識。戈登·馬歇爾 (Gordon Marshall) 曾經說過：「事實上意識是社會行動的必要組成部分……不能〔對他們〕單獨進行研究。」(1983: 263) 意識根植於社會行動之中，兩者緊密聯繫、不可分割。

資本主義剝削和鎮壓的殘酷現實已經加強了工人的階級意識，讓他們在階級利益這一更高層面上產生認同，但這並不意味着工作崗位、城市地位、性別、地理位置等內部區分會就此消失。區分依然存在，並在他們的組織過程中產生內在的動力機制，在結構性的不利因素下，為自己的權益而鬥爭。隨着世界工廠的中國工人不斷進入全球生產，這一潛在的統一由這種結構性因素所奠定。在全球化的中國，作為世界知名品牌的供應商，工廠體制將壓力轉嫁到了一線員工的身上。在全球生產的關鍵節點，在高峰期，一群身居要職的工人一旦聯合起來，就能讓生產暫停下來。儘管工人們來自不同的地方，有着不同的性別，處在不同的崗位，但是他們多次自發採取行動，維護自己的基本權利和利益，其中就包括加入真正的工會這一基本要求，但是大多數人提出的訴求更為具體，比如更高的工資、更好的福利、更完善的社保和更安全的工作環境。

在新自由主義、經濟危機和「緊縮」盛行的年代，工人運動在全球範圍內處於守勢。在中國，愈來愈多的工人開始自發抗議，採取直接行動。這些鬥爭預示着在全球資本主義的時代，中國新工人階級在逐漸形成。在跨國生產中，日益加深的階級矛盾在國內引發了勞工行動。如果新生代農民工能夠成功地建立起自己的工會和工人自治組織，他們的抗爭將不僅改變中國，而且也會改變全世界勞工和民主的未來。